

## 朱子、刘宝楠、钱穆对《论语》礼说的注释

### ——以《论语集注》《论语正义》《论语新解》为研究对象

杨兆贵 吴学忠\*

《论语》是记录孔子言行的一手材料,其学术、思想、文化地位极其重要,成为万世不刊的经典,历代学者对此屡加注释。其中,朱子(1130—1200)、刘宝楠(1791—1855)、钱穆先生(1895—1990)<sup>①</sup>三位都穷一生的精力研读《论语》,并加以注释。他们的著作分别是《论语集注》《论语正义》《论语新解》。这三本不仅是《论语》注解的权威之作,而且代表宋、清、现代三个不同时代的治学风气、思想与典范,也蕴含着他们三者的思想、治学方法与态度。作为思想巨擘的朱子、钱穆,他们的影响力更是无远弗届。钱穆又特尊朱子。这一切已使《论语》学内涵更丰盛,更有时代意义,贤人与圣人的思想交集,擦出闪亮的火花。下文先分别对三位大师注释《论语》经过及学界研究做一简单的回顾。

---

\* 【作者简介】杨兆贵,澳门大学人文社科高等研究院研究员,研究方向为先秦汉代学术文化史,朱子、钱穆学术研究。吴学忠,香港浸会大学语文中心高级讲师,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文学文化与明清小说。

① 下文在引用学者之后不加先生,非不尊学者也,乃为行文省便。钱穆先生乃我最崇敬之现当代学者之一,又是硕导陈启云教授的导师,我尤崇敬。谨先说明。

## 一、朱子、刘宝楠、钱穆注释《论语》简介及研究回顾

### (一) 朱子注释《论语》与礼书简介、研究回顾

朱子极重视经学,也极重视经学注疏、专家与师说。他注疏经学,既以汉唐注疏为主,又兼采南北宋诸儒、理学家、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说法,融贯古今、汇纳群流、采撷英华、酿制新实、气魄宏伟、局度宽大。他注疏经学,既恪守汉儒经传训诂章法,又发挥自己的新意。朱子解经大都极审慎,务求解出原书本义,但有时极大胆,极有创辟之见。<sup>①</sup> 朱子注释《论语》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况。

#### 1. 朱子注释《论语》简介

朱子一生读、注《论语》,体悟日新日进日深。他十二三岁时就跟随其父朱松读二程《论语说》。34岁编《论语要义》《论语训蒙口义》,前书是把二程及其门人与朋友的《论语》解说合编而成,后书则删节义理、思想,加进音读、训诂。可惜这两本书今已不传。43岁写成《论语精义》。随着他研读《论语》日深,他觉得诸儒的说法未必很精,后改书名为《要义》。又经过一段日子,他感到《要义》里的一些说法不是很“要”,把书名改为《论语集义》。48岁“约《精义》《口义》之妙得本旨者为《集注》”,写成《论语集注》。另有《论语或问》20卷,“疏其去取之义为《或问》”,说明他不多取诸家说而多立己说的原因。他写成《论语集注》后,到六十余岁仍然时时在修改。<sup>②</sup> 他那些修改的意见记在《语类》里,有的看法已经跟《论语集注》不同。<sup>③</sup> 本文只就《集注》里的看法加以论述,而尽量不引用《语类》。

《论语集注》是朱子从“尊德性而道问学”到“尊德性又道问学”的中期学术思

① 钱穆:《朱子学提纲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册,联经出版社,1999,第30、33—35、42页。

② 以上见钱穆著《谈朱子的论语集注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4册,第81—86页;陈荣捷著《朱熹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2,第122页。束景南著《朱熹年谱长编(增订本)》(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4,第33、59页)记朱子5岁始读《四书》,10岁在临安刻苦读《四书》,慨然有做圣人之志。

③ 钱穆:《谈朱子的论语集注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4册,第81—94页。

想的一部代表作<sup>①</sup>，也是他思想成熟的代表作。《论孟集注》征引诸说，自汉以至两宋，共 56 家，其中 41 位为宋人，所引之语以二程最多。大槻信良《朱子四书集注典籍考》指出《四书集注》有新义者 175 次。<sup>②</sup>可见，朱子对《论语》有不少新见。

朱子对《论语集注》有极大的自信，他说，《集注》每一个字都如在天平上称过的，孔子怎么说，他怎么注；不轻一点，也不重一点；不高些，不低些。他又说：“某《论孟集注》添一字不得，减一字不得。”<sup>③</sup>钱穆特推崇此书，说自宋代以来，最善于阐论《论语》义理的，“仍推朱注，断非清儒所及”；研治《论语》的，应先在朱注里打下基础，然后多观看诸家异说，这样，才能知道朱注有误的地方，也才能知道“朱注所为精善独出于诸家之上者何在”。<sup>④</sup>

## 2. 朱子编撰礼书简介

朱子一生研究《论语》。《论语》中不少论及礼乐问题。朱子一生也关心礼乐，研究、编撰礼书：他 15 岁始读《周礼》；18 岁考订诸家祭礼，写成《诸家祭礼考编》；26 岁考释奠仪、整顿礼制，作《民臣礼议》；40 岁修订《祭仪》（祭礼）稿成；<sup>⑤</sup>41 岁写成《家礼》20 卷；45 岁编次《古今家祭礼》20 卷，此书今已不存；67 岁撰成《仪礼经传通解》。<sup>⑥</sup>朱子《家礼序》说：“尝独观古今之籍，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，以为一家之书。大抵谨名分、崇爱敬以为之本。至其施行之际，则又略浮文，敦本实。”<sup>⑦</sup>朱子既重视礼的形式（名分），又重视礼的实践（行），要以爱敬、敦本、知行合一为原则。

## 3. 研究回顾

学界对朱子《论语集注》的礼思想的研究论著极少。笔者查阅中国知网，相关论著寥寥无几，简介如下：耿芳朝《朱熹经典诠释学研究——以〈论语集注〉为中

① 徐公喜：《朱子学正说》，江西人民出版社，2018，第 52 页。

② 陈荣捷：《朱熹》，第 122 页。

③ 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。本文《朱子语类》根据澳门大学图书馆网站里的“中华古籍全录”电子版。

④ 钱穆：《孔子诞辰劝人读论语及论语之读法》，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 4 册，第 66 页。

⑤ 束景南：《朱熹年谱长编（增订本）》，第 97、107、422 页。

⑥ 陈荣捷：《朱熹》，第 111—122 页。《朱熹年谱长编（增订本）》没记载朱子 41 岁写成《家礼》。

⑦ 《朱子文集》卷七十五，转引自陈荣捷著《朱熹》，第 113 页。

心》,论述朱子经典诠释学的特点与贡献。<sup>①</sup> 有关朱子礼学研究的论文较多,黄娜《朱熹礼学的经世倾向》指出朱子礼学有经世理念。<sup>②</sup> 殷慧等《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》指出,朱子治《仪礼》,考证注重义理,强调因时制宜地践履。<sup>③</sup> 孙显军《朱熹的〈大戴礼记〉研究》指出,朱子把《大戴礼记》融入儒学经典体系中,是礼学经典体系中进行会通式研究的尝试。<sup>④</sup> 姜波等《朱熹礼、理关系研究》从天理、性理、修养工夫三个角度来论述礼、理关系。<sup>⑤</sup> 许慧敏等《朱熹礼学本体论研究》指出,朱子把礼提升到本体地位,重构一个贯通天人、内容与形式统一的儒学新系统。<sup>⑥</sup> 杨静《心与礼的结合——朱熹礼学内化的厘清》认为朱子以心与礼结合,实现礼的内化,开辟天人合一的礼学途径。<sup>⑦</sup> 冯兵《朱熹礼学诠释思想的两个特征》指出两个特征:一是朱子礼学诠释对章句训诂的坚持,二是朱子把礼学诠释作为批判佛老的武器。<sup>⑧</sup> 陈俊良《朱熹论语集注的思想史分析》认为,朱子把“心”“仁”作出新的诠释。<sup>⑨</sup> 董金裕《朱熹学术考论》指出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四个特点:博采汉儒以下诸家之说,命名《集注》说明较多人心得,该书有浓厚的伊洛学色彩,兼义理与训诂,以格物穷理解释。他又指出结集《四书》的用意有三:阐明古圣相傅的道统,指示学者为学的次第,建构新经学的体系。<sup>⑩</sup> 周元侠《朱熹的〈论语集注〉研究:兼论〈论语集注〉的解释学意义》论述了朱子在《论语集注》里对礼、仁的界定,并丰富两者的思想内涵。<sup>⑪</sup>

可见,学界对《论语集注》的礼思想研究仍然很少,有待进一步论述,对加深了

① 耿芳朝:《朱熹经典诠释学研究——以〈论语集注〉为中心》,硕士学位论文,安徽师范大学,2015。

② 黄娜:《朱熹礼学的经世倾向》,《四川教育学院学报》2008年第12期。

③ 殷慧、肖永明:《朱熹礼学思想的特点》,《暨南史学》总第7辑,2012。

④ 孙显军:《朱熹的〈大戴礼记〉研究》,《苏州大学学报》2009年第1期。

⑤ 姜波、刘艳:《朱熹礼、理关系研究》,《齐鲁师范学院学报》2014年第5期。

⑥ 许慧敏、许伟:《朱熹礼学本体论研究》,《山东行政学院学报》2016年第2期。

⑦ 杨静:《心与礼的结合——朱熹礼学内化的厘清》,《北京社会科学》2018年第4期。

⑧ 冯兵:《朱熹礼学诠释思想的两个特征》,《中州学刊》2018年第10期。

⑨ 陈俊良:《朱熹论语集注的思想史分析》,《史学汇刊》2012年第29期。

⑩ 董金裕:《朱熹学术考论》,里仁书局,2008,第94—105页。

⑪ 周元侠:《朱熹的〈论语集注〉研究:兼论〈论语集注〉的解释学意义》,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2,第170—190页。

解朱子思想甚有帮助。

## (二) 刘宝楠注释《论语》简介及研究回顾

刘宝楠，字楚桢，号念楼，先治毛《诗》、郑《礼》，其后与同乡刘文淇、梅植之、包慎言、柳兴恩、陈立相约各治一经，他专治《论语》。他先仿照焦循《孟子正义》体例，先写长编，然后荟萃而成。后因官事繁忙，未能完成此书，由其子刘恭冕（1821—1884）续成。此书前 17 卷是刘宝楠所写，后 7 卷是其子所编。<sup>①</sup>

关于《论语正义》的特点及学术成就，查中国知网，约有十几篇研究论文。学者从不同方面来研究，有的学者如唐明贵、陆晓华、屈玉丽、萧刚、张文芳等从训诂、考证方面，指出该书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，尤其是清人的注释考证，注重文字训诂，对汉魏古注做了详细疏解。<sup>②</sup> 有的学者从校勘角度研究，发现本书引用皇侃（488—545）《论语集释义疏》、邢昺（932—1010）《论语注疏》，有不少引文与原著不尽相同。<sup>③</sup> 有学者论述本书引用《说文》的情形。<sup>④</sup> 有的学者比较朱子、刘宝楠注解的异同。<sup>⑤</sup> 邱培超有两篇论文专论《论语正义》的礼论，<sup>⑥</sup>这与本文的关系较大。可见，学界对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的研究多偏重在语法学、词汇学领域。

① 刘宝楠：《论语正义》，中华书局，1990，《校点说明》第 3 页。

② 见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，《校点说明》第 3—5 页；唐明贵《刘宝楠〈论语正义〉的注释特色》，《历史文献研究》总第 31 辑，2012；陆晓华《论刘宝楠〈论语正义〉的训诂方法及特点》，《安徽教育学院学报》2001 年第 2 期；屈玉丽《〈论语〉朱熹注与刘宝楠注的比较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山东师范大学，2008，第 3—54 页；萧刚《刘宝楠〈论语正义〉训诂研究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兰州大学，2008，第 22—104 页；张文芳《〈论语正义〉中刘宝楠对同义词的研究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河北师范大学，2009，第 5—44 页。

③ 范文洁：《刘宝楠〈论语正义〉征引皇〈疏〉、邢〈疏〉校勘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曲阜师范大学，2012，第 2—37 页。

④ 见班吉庆《刘宝楠〈论语正义〉征引〈说文解字〉略论》，《扬州大学学报》2001 年第 6 期；黑学静《刘宝楠〈论语正义〉对〈说文解字〉征引论析》，《平顶山学院学报》2008 年第 6 期。

⑤ 屈玉丽：《〈论语〉朱熹注与刘宝楠注的比较》，第 3—53 页。

⑥ 邱培超：《博学于文——刘宝楠〈论语正义〉论礼及习礼》，《扬州文化研究论丛》2015 年第 2 期；《文质彬彬——刘宝楠〈论语正义〉论礼于历史发展中的因革损益及其意义》，《扬州文化研究论丛》2016 年第 1 期。

### (三) 钱穆《论语新解》简介及研究回顾

钱穆一生研读《论语》，专著有《论语文解》《论语要略》《四书释义》《孔子与论语》《论语新解》。《论语文解》是他 1912 年至 1918 年任教于鸿模学校与无锡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时，根据《马氏文通》而对《论语》进行语法研究。它是钱穆的第一本书，于 1918 年出版。《论语要略》是他在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任教国文时所编写的讲义，1924 年成书。1953 年他应张晓峰之邀，把《大学中庸释义》与《论语要略》《孟子要略》合而为《四书释义》，同年出版。1974 年撰成《孔子传》，同年出版《孔子与论语》。《论语新解》1963 年出版，可说是钱穆研究《论语》的最后成果，学术成就最高，前后历经十一年。钱穆 1952 年开始以白话文撰写，后来觉得以白话文撰写，不能反映《论语》的高深文义，就改用简浅的文言文。1960 年他在耶鲁大学讲学，课余之暇写成初稿，其后不断修订，出版后又有修订。本书“备采众说，折衷求是”，为使读者便于阅读，摆脱旧注先引诸家注解再阐以己说的格式，“体求简要，辞取明净”，“仅求通俗易诵览，自不必一一征引出处”。本书所谓“新解”，是指朱注以下的新，而非要破弃朱注而自立为新，当然里面有钱穆的见解。<sup>①</sup>可见，钱穆一生研读《论语》，见解日进日深。他所花的功夫、心力，当不在朱子之下。

学界研究钱穆《论语新解》的很少，中国知网仅有几名学者发表几篇论文。林韵指出钱穆对《论语》的钻研，有强烈的文化传承与民族复兴的期待。<sup>②</sup>杨华东从辞章、考据、义理三方面系统论述《论语新解》的特色。<sup>③</sup>郭院林等指出钱穆以温情与敬意的态度来注解《论语》。<sup>④</sup>李然简单指出钱穆从《论语文解》到《论语新解》的探索过程。<sup>⑤</sup>陈洪杏批评《论语新解》倡导的“学为人之道”无法成为道德要求，忽略

① 钱穆：《论语新解·序》，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 3 册，第 6—7 页。

② 林韵：《通于古今，无物不然——从〈论语新解〉看钱穆的学术期待》，《许昌学院学报》2012 年第 4 期。

③ 杨华东：《钱穆〈论语新解〉研究》，硕士学位论文，西南民族大学，2012。

④ 郭院林、陈天伟：《温情与敬意：从〈论语新解〉看钱穆的文化态度》，《云梦学刊》2015 年第 3 期。

⑤ 李然：《从〈论语文解〉到〈论语新解〉——钱穆先生的〈论语〉探索之旅》，《上海教育》2016 年第 25 期。

仁的独立价值。<sup>①</sup> 张洪义认为,钱穆从三方面对朱子《集注》里的仁进行继承损益。<sup>②</sup>

## 二、朱子、钱穆、刘宝楠对《论语》里礼的注释

朱子是宋代以来的旷世大儒。钱穆是近现代国学大师,特推崇朱子,称许他是孔子以来在中国思想文化影响至巨的儒宗。钱穆治学,也深受朱子影响,尤其是他晚年更推崇朱子。本部分论述朱、刘、钱三者对《论语》中礼的注释,先论朱、钱,次论刘氏,这样,可直见朱、钱异同,以见两人思想、治学之承继、异同,也可拈见宋代、现代儒学在一些思想观念的异同。

### (一) 朱子、钱穆、刘宝楠对礼下的定义

朱子、钱穆、刘宝楠对《论语》里的礼各有不同的看法。下文从朱子理气论出发,根据《论语集注》相关记载,对此书中的礼思想进行论述。

#### 1. 朱子对礼下的定义:天理之节文,人事之仪则

朱子注《学而》“礼之用”说:“礼者,天理之节文,人事之仪则也。和者,从容不迫之意。盖礼之为体虽严,而皆出于自然之理。”(第51页)<sup>③</sup>又说:“愚谓严而泰,和而节,此理之自然,礼之全体也。”(第52页)

朱子指出,礼是“天理之节文”。朱子怎样解释“天理”?他说:“天,即理也;其尊无对,非奥灶之可比也。”(第65页)这里所谓的“天”,是“其尊无对”,是地位最崇高的,因此,与天相配的理,当然是地位最高的理,即他在《大学补传》里所说的“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,以求至乎其极”(第7页)的“极”,也即是作为宇宙本体、本元的理。因此,朱子把礼放在他的理气体系下来论说,一则提高礼的地位,

① 陈洪杏:《钱穆先生〈论语新解〉探微——以“学为人之道”为致思线索》,《理论与现代化》2018年第2期。

② 张洪义:《钱穆〈论语新解〉对朱子〈集注〉的继承与损益——以“仁”的解释为中心》,《平顶山学院学报》2018年第6期。

③ 朱熹: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中华书局,1983,第51页。下文《论语》原文、朱子注文的引文直引页数。

二则把礼赋予形上的根据。既然理是宇宙本体,<sup>①</sup>它必先于礼而存在,礼由理气而生成。这样,礼获得了形上的根据与保障。<sup>②</sup>

朱子在《论语集注》里第一次注解“礼”时,用了“天理之节文,人事之仪则”十个字来下定义。其后,他在《集注》其他地方注解礼,大多简称,有时说:“礼,节文也。”(第52、55页)另外,礼是人生界的规范,是人事的仪则,朱子称此为“制度品节也。”(第54页)

## 2. 钱穆对礼的概论

钱穆对礼的看法,与朱子不同:一则他没有朱子的理气体系;二则他已跳出宋明儒的尧舜禹汤文武孔孟程朱或陆王的单传的、易断的道统说,而主张继承传统文化的道统说;三则他身处中国百年巨变之局,在“欧风美雨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冲击下,重阐传统文化的价值与其现代意义,反对西化。因此,钱穆从传统文化、历史整体来注释、阐释礼的内涵。

钱穆指出:“礼,兼指一切政治制度,社会风俗,人心之内在,以及日常生活之现于外表,而又为当时大群体所共尊共守者。故只提一礼字,而历史演变之种种重要事项,都可综括无遗,且已并成一体。”<sup>③</sup>

可见,钱穆认为,礼包括了政治制度、社会风俗、日常生活、个人思想、历史演变。除了不包括内在的思想观念外,其他的人文活动都可括囊。当然,这些人文活动背后都有思想观念在驱使、影响。可见,钱穆所说的礼的内涵,比朱说的广泛。

## 3. 刘宝楠对礼的看法

刘宝楠对礼的看法,基本上继承先秦汉代礼家之说。他在注释“礼之用,和为贵”时引用《礼记·祭义》“礼者,履此者也”及《管子·心术》“登降揖让,贵贱有等,

<sup>①</sup> 朱子又以无极、太极来解释宇宙本体,大概言之,他说的无极等于理,太极等于气。无极、太极说是他的宇宙本体论的另一种说法。两者相容而不背。

<sup>②</sup> 张岱年把本体论和宇宙生成论归为宇宙论,称前者为本根论,后者为大化论。见《中国哲学大纲·序论》,载《张岱年全集》第2册,河北人民出版社,1996,第4页。本文把本根论、大化论统称为宇宙论、形上学。

<sup>③</sup> 钱穆:《论语新解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5,第48—49页。下文凡该书引文都直接在引文后标明页数。

亲疏有体,谓之礼”<sup>①</sup>来解释,可见,他认为礼,大的指社会秩序、血缘伦理,小的指个人行为动作等。礼除了规范个人行为,他还认为“礼者,所以整壹人之心志,而抑制其血气,使之咸就于中和也”(第149页),也规范了个人的血气、意志。

#### 4. 小结

刘宝楠作为清儒代表,治经学墨守汉儒说法,较少提出新见。朱子从理气体系角度对礼下的定义,是对传统礼说的阐说,提高了礼的形上地位。先秦儒家对礼的起源、作用等有不少说法,《礼记》的说法可作为代表。<sup>②</sup>它对礼的产生有几种说法,《中庸》认为是出于亲疏尊卑的社会等级关系,《礼运》篇认为源于饮食,《礼运》篇引孔子之言说:“是故礼必本于天。”<sup>③</sup>这个天是自然天,而非本体天。孔子所说的天,大概有四种看法:自然界、关怀人世的主宰、使命的本源、命运。<sup>④</sup>可以说,朱子对礼的看法,比起孔子、《礼记》的说法,大大提高了礼的地位。朱子说:“礼者,天理之节文,人事之仪则也。”前一句是从本体的角度来给礼定位,使礼有形上的根据,礼成为宇宙生成的一部分。后一句是从人事、人生界来说礼的性质。这样,礼贯通了天、人,既是宇宙与人事的桥梁,形上与形下的媒介,也是人事的规范。钱穆认为,在最初时期,礼是从人与天、人与神、人与鬼的接触而起的,那是宗教仪式,是人生界与宇宙界感通的一条路程。礼既是人我交接又是人我不可逾越的线。<sup>⑤</sup>从这点来看,朱子的礼说继承了先秦儒家礼说内涵,并扩而大之。钱穆除了从天人关系简述礼的起源,还从人心、历史、文化整体来解礼。

## (二) 朱子、钱穆、刘宝楠对礼的原则的见解

### 1. 朱子的见解

朱子对礼的原则提出以下几个看法,现分论如下。

① 刘宝楠:《论语正义》,第29页。下文正文引文直引该书页数。

② 钱穆认为《礼记》《易传》成篇于战国末期,详见钱穆著《易传与小戴礼记中之宇宙论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18册,第25—74页。

③ 王文锦:《礼记译解》,中华书局,2001,第289页。

④ 傅佩荣:《儒道天论发微》,台湾学生书局,1985,第27—147页。

⑤ 钱穆:《中国思想史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24册,第17页。

### (1) 反对礼为和而和

《学而》记有子说：“礼之用，和为贵。”朱子注：“承上文而言，如此而复有所不行者，以其徒知和之为贵而一于和，不复以礼节之，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，所以流荡忘反，而亦不可行也。”（第 51—52 页）朱子指出，礼乃“天理之节文”，遵礼、践礼，都必须以理为前提，先知理而后行礼，这是践礼的工夫。和是礼的一个作用。礼还有其他作用，如《礼运》篇说：“是故礼者，君之大柄也，所以别嫌明微，俟鬼神，考制度，别仁义，所以治政安君也。”<sup>①</sup>礼是国君手里的一个大的权柄，国君可以用它来区别嫌疑，敬事鬼神，建立制度，分别仁义等。朱子这里说“不复以礼节之，则亦非复理之本然矣”，强调礼是理的节文、理的一部分，凡事以理为主，在遵理的原则下才能有“和”。

### (2) 主张凡事以礼(理)为主，礼不逆理

朱子对理有不同的看法，理有不同的含义，有作为宇宙本体的最高的理，有作为人事的事理，也有万物之理，还有“所以然而不可易”（自然规律）及“所当然而不容己”（道德准则）等。<sup>②</sup>他主张事以理为主，即是主张以事理为主。因此，他主张礼不逆理。

朱子从最高位置的本体理气来说“天至尊，天即理”（第 65 页），所以，“逆理，则获罪于天。”钱穆认为，朱子认为理气相合不相离，若只说理，则天是理。后世学者批评朱子以“天即理”解“获罪于天”的天，以“逆理即逆天”解“获罪于天”，是不合原文之义的。钱穆认为朱子“天即理”当未包尽朱子说天之义。朱子在《中庸章句》说：“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，天即理也。”天除了是理的含义外，还以气化生万物，天也是气。因此，朱子所说的天包含理、气。<sup>③</sup>

朱子从天理的角度批评那些违礼之事。违礼之事就是天理不容！春秋中后期屡屡发生臣弑君违礼之事，也即做了逆理之事，朱子批评说：“臣弑其君，人伦之大变；天理所不容，人人得而诛之，况邻国乎？”（第 154 页）朱子也批评诸侯、家臣破坏礼制：“先王之制，诸侯不得变礼乐，专征伐。陪臣，家臣也。逆理愈甚，则失之愈

① 王文锦：《礼记译解》，第 295 页。

② 张岱年：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1987，第 43 页。

③ 钱穆：《朱子学提纲》，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 11 册，第 43 页。

远。”(第 171 页)破坏礼制,尤其是家臣僭越礼制,逆理尤甚。可以说,理是礼的“所以然”、背后的理论根据。这是朱子与先秦儒、汉儒说礼的不同之处。

### (3) 礼贵得中,先质后文

朱子注“林放问礼之本”一章云:“礼贵得中,奢易则过于文,俭戚则不及而质,二者皆未合礼。然万物之理,必先有质而后有文,则质乃礼之本也。”(第 62 页)朱子提出“质乃礼之本”,在《论语集注》里提出作为礼的“本”或“质”,包括德、忠、信、敬、仁、义等。因下文论礼的本源,故此处不赘述。

## 2. 钱穆的见解

钱穆对礼的原则有一己之见,有些与朱子不同。朱子多从理方面来强调,钱穆则多从人心、人情来阐明。

### (1) 礼因人心、人情而建立,不能为求和谐而制礼

有子反对在没有礼的节制下,只为和而和。朱子主张在遵理的原则下才能和。钱穆则直接指出:“礼必和顺于人心,当使人由之而皆安,既非情所不堪,亦非力所难勉,斯为可贵。”(第 18 页)强调礼要顺应人心、人情,根据个人不同的人力财力,选择现存的适当的礼(包括礼节或礼仪),才能真正地和。礼是因人情而建立,人自然能适应礼,能在礼制下适性地自由自在地生活,而“礼非严束以强人,必于礼得和”(第 18 页)。可见,钱穆认为礼是因人心、人情、人力而建立,这是因;因人心、人情而建立的礼,其结果自然会是和。有此因,才有此良好的结果;如果只想有和谐的结果,而建立礼制,如此倒果为因,这样的礼强迫人,不顺应人心、人情,违反孔门言礼之精义。可见,钱穆从人心、人情角度来论礼,也从这方面来论仁(详下)。

### (2) 礼因时而变,必从历史中探求礼的演变

朱子主张礼贵得中,钱穆也强调礼贵中,同时强调礼因时而变。他说:“礼贵得中,本末兼尽”(第 56 页),同时指出:“人类社会亦时时必有礼,此乃历史之常。但礼必随时代而变,此乃礼之时。而变之中仍存有不变者,此乃礼之意。”(第 49 页)礼有内在的意与外在的文,内在即内心,“内心为质为本,外物为文为末”(第 55 页),内在的质、本是仁,是人心(第 54 页),外在的文是礼的形式(礼文)。礼文随时而变,与时俱变,而内在的仁、心则不变,“礼必随时而变,仁则亘古今而一贯更无可变”(第 54 页)。人同此心,心同此理,心皆有仁,此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圣人皆同。

钱穆注“周监二代”时,说孔子“于三代之礼,先后文质因革之详,必有其别择之

所以然”(第 67 页)。他注“郁郁乎文哉”说:“历史演进,后因于前而益胜,礼乐日备,文物日富,故孔子美之。”(第 67 页)他认为三代礼文是不断与时而变,根据历史演变规律,礼文往前演变,日益繁富。对于礼制演进变化,钱穆反对空谈义理,强调着手“历史演进之实迹”(第 68 页)研究。可见,他强调从历史事迹里探求礼的演变。

### (3) 礼有文节,各尽本分

钱穆指出“礼有文有节”(第 56 页)。礼有文(外在形式),有质(内在的意),有变(与时俱变),也有节。节有节制、节限、礼仪等意思。钱穆重视礼的节制,“若惟知有本,不文不节,亦将无礼可言”(第 56 页),可见节制在礼中有重要的作用。这也是礼的一个重要原则。钱穆重视礼中的节限,“礼虽有上下之分,然双方各有节限,同须遵守,君能以礼待臣,臣亦自能尽忠遇君”(第 73 页),他强调参与礼的各方的人要尽自己的本分、责任,这样就能感召对方。

可见,钱穆虽极其崇敬朱子,但是在礼的原则上,看法未必与朱子相同。这也是他对《论语》、孔学潜润日多,卓然成家有关。

## 3. 刘宝楠的见解

### (1) 礼中有和,礼贵得中

刘宝楠在注“礼之用和为贵”说:“和是礼中所有,故行礼以和为贵。”(第 29 页)又说:“礼贵得中,知所节,则知所中。”(第 30 页)他在注“林放问礼之本”章说:“礼贵得中,凡丰杀,即为过中不及中也。过中不及中,俱是失礼。然过中失大,不及中失小,是故文家多失在过中,质家多失在不及中。”(第 82 页)他强调礼的原则是得中,不过中、不及中。过或不及都是失去了礼的原则。他认为历史上文家、质家各有不足,文家比质家的过失更多。

### (2) 礼有变有因

刘宝楠主张礼有因有变,看法与钱穆相同。他认为礼不变的是孔子所说的“因”。马融解“因”为“三纲五常”(第 71 页),刘氏则指“礼之无所损益者,即荀子所谓‘百王之无变’”(第 73 页)。《荀子·天论》篇说“百王之无变,足以为道贯”,所谓“道贯”,当指以理治乱、天人相分、“隆礼尊贤而王”(《天论》)等一系列举措,也即礼义之统。此外,刘氏赞成所“因”的当指三纲五常(仁义礼智信)。

至于礼的变化,刘氏从文、质之利弊、互补来说明。他指出“礼所以有损益者”,

如夏尚忠，“而其敝则蠢而愚”；殷承夏，“而其敝则荡而不静”；周承殷，“而其敝则利而巧”（第 72 页），周文郁郁然，但其流弊则文巧奸蔽，因此，继周的只能以质来挽救。他指出：“凡所损益，皆是变易之道。”（第 72 页）

### （三）朱子、钱穆、刘宝楠对礼的本源的看法

#### 1. 朱子的见解

综览《论语集注》，朱子对礼的本源有以下看法。

##### （1）仁为礼之本

朱子与先儒相同，认为礼有其本源。《论语·八佾》记孔子说：“人而不仁，如礼何？人而不仁，如乐何？”认为礼的本源是仁。朱子继承此说，以理来解释。

朱子注“其为仁之本与”说：“仁者，爱之理，心之德也。”（第 48 页）在《论语集注》里，他从理方面来解释仁的文字比较多，从德方面来解释则比较少。

朱子从理方面解释仁的文字如：“盖无私心，然后好恶当于理，程子所谓‘得其公正’是也。”（第 69 页）“未知其皆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也，是以夫子但许其忠，而未许其仁也。”（第 80 页）则“出于天理而无人欲之私”为仁。“愚闻之师曰：当理而无私心，则仁矣。”（第 80 页）“仁者，心之理，非在外也。”（第 100 页）“克、伐、怨、欲不行焉，可以为仁矣？”（《宪问》）朱注：“仁则天理浑然，自无四者（指克、伐、怨、欲）之累，不行不足以言之也。”（第 149 页）“仁人，则成德之人也。理当死而求生，则于其心有不安矣，是害其心之德也。当死而死，则心安而德全矣。”（第 163 页）“行是五者（按：指恭宽信敏惠），则心存而理得矣。”（第 177 页）

可见，朱子认为，仁是理，是天理，如果成了仁者，则天理浑然，一举一动都符合理。天理与私欲是相对而不相容的，有天理，则没有私欲；有了私欲，天理就不得彰显。因此，仁出于天理，而无人欲之私，私欲如克、伐、怨、欲这些行为就不会出现，相应的，就能做到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这些道德行为。有公理而无私欲，这样，仁是公正的。朱子又说，仁是爱之理、心之理。他认为性是理，那么，仁是性，也是理。性是天赋于人的命。从这点来看，朱子是性善论者。孔子讲仁，是从心、人格、境界来讲的，而朱子则侧重从理、性方面来讲，这是他与孔子的不同之处。

另外，朱子从德来解释仁。他说：“仁者，心之德。心不违仁者，无私欲而有其德也。”（第 86 页）又说：“仁，则私欲尽去而心德之全也。”（第 94 页）“仁者，心无私

累,见义必为。”(第149页)他注解“一日克己复礼”(《颜渊》)云:“仁者,本心之全德。”“盖心之全德,莫非天理,而亦不能不坏于人欲。故为仁者必有以胜私欲而复于礼,则事皆天理,而本心之德复全于我矣。”(第131页)“日日克之,不以为难,则私欲净尽,天理流行,而仁不可胜用矣。”(第132页)

朱子指出仁是心之德。所谓德者,得也,得之于心,得天理于我人之心。所以说“心之全德,莫非天理”,“仁者,本心之全德。”这样,整个心完全没有一毫私欲,完全充满天理,就是仁。<sup>①</sup>

可见,朱子所说的仁,统合了心、性、理、公,克去私欲。他讲仁,既侧重理这虚静、规条的一面,又认为仁能克胜私欲,没有私欲,能做到恭、宽、信、敏、惠,突出仁有主动的心的一面。<sup>②</sup>这是朱子调和先秦儒(重视“道”,偏向人为主动一面)、宋儒(重视“理”,侧重规范虚静一面)的说法。仁是理、爱之理、心之理、当于理,礼是天理之节文、人事之仪则,这样,礼是理的“文”,是理的外在表现形式(纹理),仁是礼的本源,这样解释符合朱子理学说。同时,朱子把仁、礼都纳在理学体系中。<sup>③</sup>

## (2) 德是礼之本

《为政》记孔子说:“道之以政,齐之以刑,民免而无耻;道之以德,齐之以礼,有耻且格。”朱子注:“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,而德又礼之本也。”(第54页)可见,德也是礼的本源。何谓德?朱子说:“德之为言得也,得于心而不失也。”(第53页)“怀

---

① 钱穆指出,朱子的心性论里,心属气,性属理。朱子说性理,是从宇宙界的理气论直接来阐述心性的。朱子说性即理,又说性气不相离,也不相杂,这就把张载所说的天地之性、义理之性、气质之性分别全都融化了。见钱穆著《朱子学提纲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册,第46—47、49页。

② 朱子在《语类》中提到仁是心的说法,如《朱子语类》卷十九:“孔门虽不曾说心,然答弟子问仁处,非理会心而何。仁即心也,但当时不说个‘心’字耳。”《朱子语类》卷二十:“孝弟便是仁。仁是理之在心,孝弟是心之见于事。”钱穆认为,论宇宙,似乎理的重要性比气更甚;论人生界,心比性更重要。人生界重视工夫,工夫全在心用上。因此,朱子特重心的重要性,“理学家中善言心者莫过于朱子”。(钱穆:《朱子学提纲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11册,第50页)

③ 《朱子语类》有这种明白的说法,如卷二十论语二:“‘仁者爱之理’,是将仁来分作四段看。仁便是‘爱之理’,至于爱人爱物,皆是此理。义便是宜之理,礼便是恭敬之理,智便是分别是非之理。”又,朱子在不同时期对仁有不同体悟、不同看法,可参钱穆著《朱子论仁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12册,第141—190页。

德,谓存其固有之善。”(第71页)“德,谓义理之得于己者。”(第162页)可见,朱子对德的看法既有继承传统说法,又有一己之见。传统的看法即德是内在于得的。这种看法由商代开始,<sup>①</sup>后世一直沿用。对德的创见,朱子认为德也是理,是理的一种,是义理而内在于心者。

### (3) 忠、信、敬为礼之本

朱子注《八佾》“林放问礼之本”章云:“礼贵得中,奢易则过于文,俭戚则不及而质,二者皆未合礼。然凡物之理,必先有质而后有文,则质乃礼之本也。”(第62页)那么,“质”包括哪些德目?朱子注:“礼必以忠信为质,犹绘事必以粉素为先。”(第63页)何谓忠、信?朱子说:“尽己之谓忠,以实之谓信。”(第48页)“信,约信也。”(第52页)“有是忠信之实,则虽其才知礼乐有所未备,亦可以为成人之次也。”(第152页)

朱子认为敬也是礼之本源。他注《八佾》“为礼不敬”说:“为礼以敬为本。”(第69页)他注“子入太庙”章说:“敬谨之至,乃所以为礼也。”(第65页)

## 2. 钱穆的见解

### (1) 以心、情、意解仁,赞成仁为礼之本

钱穆赞成孔子、朱子仁是礼之本的看法。他对仁的理解与朱子有很大的差别。首先,朱子以理解仁,钱穆则从心、情、意等方面来论仁。

从心来解释,钱穆说“仁乃一种心境,亦人心所同有,人心所同欲”,“人之所以为人,主要在心不在境”(第84页)。他以心来解忠恕,“忠恕之道即仁道,其道实一本之于我心”(第98页)。他批评清儒以行事解忠恕,“不知忠恕固属行事,亦确指心地。必欲避去一心字,则全部《论语》多成不可解。”(第99页)仁是心,而非理。这是钱穆和朱子对仁的一个极大的差别。

钱穆从情、意来解仁。他指出,仁“其最先之心言,则是人与人间之一种温情与善意”(第7页),“仁乃人与人间之真情厚意”(第54页)。他指出礼有内、外,内指内心,“内心为质为本”,就是仁。(第55页)情、意是心表现的外显,钱穆以情、意来解释仁,可说是以心论仁的进一步阐发。

钱穆除了从心、情来诠释仁外,还梳理了仁的内涵。仁除了是心境、温情善意

<sup>①</sup> 杨兆贵:《先秦“德”说视域下的周公“德”论》,《天中学刊》2020年第5期。

外,又是“人群相处之大道”(第6页),又包括德(第6页),它是人生的全德(第116页)、至高的德(第115页)。因此,钱穆对仁的内涵分梳比朱子细致。

钱穆还指出没有仁者真正好人恶人之弊。不仁之人,不能有真正真实厌恶不仁者之心,多为私欲所蒙蔽,会“使恶人亦得攘臂自在乎人群中,而得人欣羨,为人趋奉。善人转受冷落疏远,隐藏埋没。”相反,只有真正好人恶人,“人人能安仁利仁,使仁道明行于人群间,则善人尽得人好,而善道光昌,恶人尽得人恶,而恶行匿迹。人人能真有其好恶,而此人群亦成为一正义快乐之人群。”(第85页)可见,人能否真正好人恶人,关系到善人、恶人的升降,还关系到人群、人心、人道。一心之念对人群、人道有这么大的影响,不能不慎其独。

钱穆赞成仁为礼之本。他对两者关系进行较多的论说。首先,他直接明白说仁是本,礼为末:“礼之本即仁”(第54页),“礼有内心,有外物,有文有质。内心为质为本,外物为文为末”(第55页)。其次,钱穆指出礼文是外在的,随时而变,而仁是内在的,是不变的:“礼必随时而变,仁则亘古今而一贯更无可变”(第54页),“礼必随时而变,仁则古今通道”(第83页)。最后,钱穆从感情表达来说明仁与礼的关系:“仁乃人与人间之真情厚意。由此而求表达,于是有礼乐。若人心中无此一番真情厚意,则礼乐无可。”(第54页)

## (2) 德、让、忠恕也是礼之本

这种说法是对仁为礼之本说的推衍。钱穆指出,德乃指德性,即人的品德。(第24页)德是一个概念范围较广的名词,它在先秦的内涵极丰富,<sup>①</sup>可以包括仁德。仁德是孔子认为境界最高的德,所以他不轻易许人以仁德。(第115页)至于让、忠恕都是仁德里的德目,它们都是礼的本质:让是“礼之质”(第96页);忠恕也是心,尽己之心谓之忠,推己之心及于他人谓之恕,它们同出于仁之心。“忠恕之道即仁道,其道实一本之于我心,而可贯通之于万人之心,乃至万世以下人之心。”(第98页)因此,忠恕之心乃仁心,乃钱穆所说的文化心历史心这一人类文化大心。<sup>②</sup>可见,钱穆说德、让、忠、恕是礼之本,是从文化心、道心、仁心这一心学角度来贯通说明的。

① 杨兆贵:《先秦“德”说视域下的周公“德”论》,《天中学刊》2020年第5期。

② 钱穆:《心与性情与好恶》,载《钱宾四先生全集》第18册,第203页。

由此可见,钱穆虽然对礼之本为仁、德、忠等看法与朱子相同,但是在对仁的内涵分梳与朱子不尽相同。他从心学角度诠释仁、忠恕,与朱子从理来解释不同。

### 3. 刘宝楠的看法

刘氏同样赞成仁是礼之源。他对仁的看法与朱子、钱穆有同有异。先说不同的,他赞成《论语》仁有“爱人”之义,其次他接受《说文》对仁的定义:“言己与人相亲爱也。”(第8页)易言之,他对仁的内涵有这样的看法:先是爱人,其次是使人相爱。再次,他认为仁是德目的总称,是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德的统称。(第8页)

另外,刘氏对仁的看法有一点很特别的是,他以情、理来解释仁。他说:“夫仁者,情得其正,于人之善者好之,人之不善者恶之,好恶咸当于理,斯惟仁者能之也。”(第141页)朱子以理解仁,而刘氏既以情解仁又以理解仁,可见,他既不完全赞成理说又能继承、发挥“仁者爱人”的情感说,可以说这是他对朱子理说的补充(应该不是对朱说的不满)。刘氏不仅以情解仁,而且直接说礼出于人情:“先王制礼,缘人情世事而为之,节文以范围之。”(第82页)也可以说,礼出于情的仁。

又,刘氏还以人的好恶之情来说仁:“盖仁者好恶,有节于内,故于富贵则审处之,于贫贱则安守之。”(第142页)仁者与常人相同,有好恶之情,但他与常人不同的是,能节制自己内在的好恶之情,对常人所热烈追求的富、贵或不喜欢的贫贱能小心处理,能“以道得之”。(《里仁》)

最后,刘氏以心来解仁:“夫仁,人心也。人即体质素弱,而自存其心志之所至,气亦至焉,岂患力之不足?”(第144页)他明白指出仁是人心,强调心志的重要性。

总结刘氏对仁的看法,他应认为以理说仁不能完全把握仁的内涵,因此以心、情及好恶来解仁。可见他对仁的解释已与朱子不同,而钱穆对仁的看法则基本与刘氏相同。

刘氏也赞成让、忠恕为礼之本。他解“能以礼让为国乎”说:“‘让’者,礼之实;‘礼’者,让之文。”(第149页)礼之实,又可指忠恕。他解忠恕说:“盖忠恕理本相通,忠之为言中也。中之所存,皆是诚实。”又说:“诚者,实也;忠者,亦实也。君子忠恕,故能尽己之性;尽己之性,故能尽人之性。非忠则无由恕,非恕亦奚称为忠也?”(第153页)忠恕之理相通,忠为本,恕为用,两者相通为一。刘氏进一步指出:“能行忠恕,便是仁圣。”(第154页)这句话抬高了忠恕的地位,因为忠恕只是作为德的统称之仁的两个德目,它们的地位不能与仁圣相比。孔子称赞令尹子文

“忠”，而不称许他是仁者。《公冶长》可见，孔子认为忠的地位不如仁。所以，刘氏受曾子“夫子之道忠恕而已”误解，以为忠恕就是仁道。

#### (四) 朱子、钱穆对礼的作用的看法

##### 1. 朱子的看法

###### (1) 好礼的好处：安处乐，乐循理

朱子注《学而》子曰“可也；未若贫而乐，富而好礼者也”句云：“凡曰可者，仅可而有所未尽之辞也。乐则心广体胖而忘其贫，好礼则安处善，乐循理，亦不自知其富矣。”（第 52 页）这条材料注释比较符合原文，但朱子仍说“好礼则安处乐，乐循理”，循理则快乐。

###### (2) 礼治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平

朱子注《为政》篇记孔子论德、礼、政、刑一段名句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”云云，说：“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，德礼之效，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。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，又当深探其本也。”（第 54 页）所谓“本”，指德、礼。

朱子注“立于礼”（《泰伯》）云：“礼以恭敬辞逊为本，而有节文度数之详，可以固人肌肤之会，筋骸之束。故学者之中，所以能卓然自立，而不为事物之所摇夺者，必于此而得之。”（第 105 页）

##### 2. 钱穆的看法

###### (1) 礼因人情而立，可以顺民心

钱穆认为，如根据人情、人心而制礼，则礼可以“和顺于人心”，社会和谐。相反，为求和谐而建礼，可能违反人心人情，礼就成为强制性的制度，不利于人心人情。（第 18 页）

###### (2) 尽礼可使大家各得其所

钱穆注解“君使臣以礼，臣事君以忠”时，指出“礼虽有上下之分，然双方各有节限，同须遵守”，并进一步指出“本章见社会人群相处，贵能先尽诸己，自能感召对方”。（第 73 页）“感召对方”是大家各尽礼分而取得双赢的结果。

### 三、结语

朱子、刘宝楠、钱穆是宋、清、现代三位研治《论语》的大师。朱、钱更是淹通四部的旷世宗师，钱又特别推崇朱，对朱的很多学说、治学方法甚有契合。《论语》记载了圣人孔子的言论，后世学者根据他们的时代、思潮和自己的体悟、思想进行诠释。

朱子、刘宝楠、钱穆代表了三个时代的顶峰，对《论语》进行注释、阐释。朱子建立理气论，以此为框架，对《论语》的礼、仁等内涵进行阐释。他把礼放在理气思想体系里加以定位、论述。《论语》里的礼学成为理学的一部分。礼学一方面纳入他的理学体系，另一方面也保留传统礼学的特点。朱子除了把礼学纳入理学，他对礼的看法：一是认为礼的内核是三纲五常；二是认为礼的原则包括反对为和而和，主张凡事以礼（理）为主，礼不逆理，礼贵得中、先质后文；三是礼的本源来自仁、德、忠、信、让等；四是好礼有良好的作用，如能使人安乐，能提升人民的道德水平。

钱穆虽然学宗朱子，但是他的一些看法与朱子不同：他从历史文化大传统角度来阐释。他从心、情、意来解仁，从文化历史来解礼，这与朱子有很大的区别。

刘宝楠对礼、仁的解释，既有继承先秦汉儒之说，又有对朱子说的补充，以心、情及好恶、理、节欲来解仁。他上承朱子说，下影响了钱穆。